

## 谈谈关于《文赋》的研究

张少康

陆机的《文赋》是我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篇全面地论述文学创作问题的理论专著。与博大精深的《文心雕龙》相比，《文赋》当然是难与并列的；但是，《文赋》也有它的独特之处。它着重在具体分析整个创作过程，而作者又有许多创作甘苦的亲身体会，它所提出的问题都是创作实践中经常遇到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说，《文心雕龙》又不如它。程千帆先生在解放前所辑《文学发凡》（修订后改名《文论要诠》）中说：“盖单篇持论，综核文术，简要精确，伊古以来，未有及此篇者也。”这个评价是比较中肯的。由于《文赋》在历史上有这么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它又被肖统收进了我国第一部文学总集《文选》，所以历来对《文赋》的研究是比较多的。“五四”以前比对《文心雕龙》的研究还要多，从“五四”到现在，在古代文学理论的研究中，仅次于《文心雕龙》。为了使《文赋》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如何批判地吸收历代对《文赋》研究的成果，是一个很值得我们重视的问题。

历史上对《文赋》的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五四”以前对《文赋》的研究，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第一，是历代《文选》注家对《文赋》的诠释。唐代的李善是第一个注释《文选》的。李善对《文赋》的注释，与注释《文选》中别的篇不大

一样，不只是词义训诂和典故出处，而是对《文赋》的内容和观点有所阐发的。骆鸿凯在《文选学》中说：“往者李善注选，类引事而鲜及意义，独于《文赋》疏解特详，资来学以津梁，阐艺林之鸿宝，意至善也。”李善注释至今仍是我们研究《文赋》的最重要资料之一。但李注也有一些缺点和不足之处，诚如骆鸿凯所说：“第精理微言，犹未曲畅；张皇补苴，尚待后人。”唐代五臣注《文赋》，对李注有所补充，于文义方面亦稍有发挥。其后明清的一些重要的《文选》注家，如张凤翼、陈与郊、闵齐华、余萧客、于光华、孙志祖、许巽行、张云璈、胡绍煊、梁章钜、朱琮、汪师韩等，在文字校勘、词义训诂诸方面或多或少亦有一定贡献。此外，何焯、孙月峰、于光华等的评点，对《文赋》的释义也有某些启发。《文赋》虽然是用赋体写的，比较难懂，但经过他们的这些工作，《文赋》的基本意思是比较清楚了。第二，是历代作家和文学批评家对《文赋》及其中某些理论观点的评论和发挥。最早论及《文赋》的是陆机的弟弟陆云。齐梁之际，刘勰、沈约、陆厥、钟嵘等重要文学批评家也都评论过《文赋》或其中某一观点。唐宋以后，随着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和文学批评专著的大量出现，其中引用、转述、评论和发挥《文赋》中某些论述的是相当多的。象唐代的楼颖、明代的徐祯卿、谢榛、胡应麟、清代的王士禛、邓绎、朱彝尊、汪师韩、章学诚、王闿运、阮元等，都对《文赋》中某些观点有过较为重要的评述。其中涉及到了文学创作中的认识和实践（“知”与“能”）关系问题、创作构思和想象活动的关键——“虚静”的问题、“诗缘情而绮靡”的评价问题、继承和创新的关系问题、创作灵感（“应感之会”）的问题等等。但是，从理论上对《文赋》作全面的分析和研究还没有过。

“五四”以后到全国解放前这个时期，对《文赋》的研究有

了很大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对《文赋》的诠释开始有人做了综合前人注解并加以辨析发挥的工作，例如骆鸿凯的《文选学》、许文雨的《文论讲疏》、唐大园的《文赋注》、程会昌的《文论要论》等。第二，出现了一些研究《文赋》中所论述的问题和其他文论著作中有关论述的关系的著作，例如郑石君、李全佳等的《文赋义证》之类。第三，有了一些逐段分析讲解《文赋》的文章和全面地研究《文赋》的理论文章。例如方竑的《文赋绎意》、荷魄的《陆机文赋论》等。有的文章已经抓住了《文赋》论创作这个中心，并作了较为详尽的分析。

解放以后，有关《文赋》的译注和研究论文约有二、三十篇。许多作者力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来研究《文赋》，把《文赋》译注成现代语体文介绍给广大群众，并且对其中所涉及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展开了讨论。例如关于《文赋》的本质，陆机的文艺理论和创作实践的关系，《文赋》中对艺术构思、想象、灵感、结构、修辞等的论述。《文赋》的研究大大地深入了，但也还存在着不少分歧和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其中也有一些是前人已经作了研究，或已提供了重要线索，而我们还研究得不够的问题。比如拿《文赋》的思想来源和对后代的影响（特别是和《文心雕龙》的关系）这两个问题来说，就是如此。

陆机在《文赋》中所体现的文艺思想，究竟主要是受道家的思想（包括玄学思想）影响呢，还是受儒家的思想影响呢？或者是另有所本的呢？本来从李善对《文赋》的注释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文赋》的创作思想主要是受道家思想影响的。李注告诉我们，《文赋》在关键之处引用老庄的论述共有十一处。当然，主要还不是因为陆机在《文赋》中用了许多老庄的概念和典故，如“玄览”、“天机”、“橐籥之罔穷”、“轮扁所不得言”

等，而是陆机创作思想中的基本观点确是从老庄那里来的。关于《文赋》的思想来源，解放以来许多研究《文赋》的文章和著作很少谈到。这可能是和1959年景卯同志的一篇评论《文赋》的文章<sup>①</sup>中比较简单化的批判有关的。景卯同志的文章倒是没有回避陆机创作思想主要受道家思想影响这个事实，但是他把受道家思想影响当作了否定《文赋》的根据。于是，后来有些文章为了肯定《文赋》，就说《文赋》是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根据有二：一是陆机出身世代儒家门第，他的祖先陆绩是著名经学家。而陆机本人据《晋书·陆机传》说，又是“服膺儒术，非礼不动”的。二是《文赋》首段强调“颐情志于典坟”，末段论“文用”也是儒家观点。但是，这些并不能说明陆机的创作思想也是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景卯同志文章的问题，不在它指出了陆机受道家思想影响这一点，而在于它一笔抹杀了道家思想对艺术创作曾经起过的有益的和积极的影响。

《文赋》所反映的道家文艺思想影响，根据前人研究来看，主要表现在下列三方面。第一，关于言意关系问题。陆机在《文赋》序中提出的“意不称物，文不逮意”问题，是和当时思想界争论的“言不尽意”问题有极其密切的关系的。言意关系问题讲的是语言能不能充分表达思想的问题。而在文学创作中，作家的思想不是赤裸裸地直白说出，而是通过形象地反映现实生活来流露的。文学创作在用语言（“文”）形象地反映客观现实生活（“物”）的时候，又是必须通过作家的主观认识（“意”）来构成形象的。所以，“言不尽意”在文学创作中就成了“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的问题。儒道两家在言意关系上历来有尖锐分歧。儒家是主张“言尽意”的，道家是主张“言不尽意”的。陆机的看法，

---

<sup>①</sup>《光明日报》1959. 9. 13.

正如郭绍虞先生在《关于〈文赋〉的评价》一文中早已指出的那样，是明确地站在“言不尽意”一边的。他在《文赋》中虽然也力图解决“意不称物，文不逮意”问题，但主要是归结到要“虚静”、依靠“天机”这些道家原则，并且直率地指出：“若夫随手之变，良难以辞逮。”还特别强调：“若夫丰约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适变，曲有微情。……譬犹舞者赴节以投袂，歌者应弦而遣声。是盖轮扁所不得言，故亦非华说之所能精。”李善注中这两处注都引了《庄子》中轮扁斲轮的故事来说明其“言不尽意”之旨。何焯于后一段下评曰：“作文之妙处不可言，但去其病处而妙已全矣。赋中历剖病处，正要人从此下手，究竟赴节应声之妙，原不可言文也，几于道矣。”<sup>①</sup>何焯这段话是深得陆机写《文赋》本意的。言究竟能不能尽意，此处且不论。这里我们要着重说明的是，道家主张“言不尽意”，但并不是说根本就不要“言”。庄子自己的思想和理论不也是要通过语言来表述的吗？主张“言不尽意”的玄学家为了说明“言不尽意”的道理不也是要通过语言的吗？其实，庄子也好，玄学家也好，也还是要语言的。不过，他们认为语言本身只是一个表意的象征性符号，象捉鱼的荃，逮兔的蹄。“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庄子·外物》）目的在它所象征的“意”，因此得出了“得鱼忘荃”、“得意忘言”的观点。王弼在《周易例略·明象》篇中对此曾作了充分的发挥。他分析《周易》的言、象、意的关系道：“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这种“言不尽意”的观点，从哲学上说是含

<sup>①</sup>于光华《文选集评》引。

有唯心主义神秘色彩的。但是，在文学创作上却可以借它来说明文学的形象特征。文学是以语言为工具来塑造艺术形象，并通过这些艺术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和体现作家的一定的思想观点的。文学作品中的思想意义需要读者从形象中去认识和体会，而不能局限于语言文字本身的意思。所以，对文学作品来说，常常是“言不尽意”的。陶渊明《饮酒》诗云：“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诗中的“真意”，确是在言外的。真正艺术水平高的文学作品应该能做到“不落言荃”、“意在言外”、“言有尽而意无穷。”陆机对文学的形象特征是深有体会的，他之所以主张“言不尽意”也与此有密切关系。当然，我们必须看到“言不尽意”论反映到文艺理论上，已经和它在哲学上的含义有了很大的不同。

在言意关系问题上，刘勰和陆机是完全一致的。他在《文心雕龙·神思》篇中所讲的思、意、言的关系，和《文赋》中说的物、意、文的关系是相近的。刘勰所说的“思”，即是陆机所说的“物”在作家思想认识上的反映。刘勰说“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即是说的“意不称物，文不逮意”问题。刘勰在《序志》篇中说：“言不尽意，圣人所难，识在瓶管，何能矩矱？”就非常明确提出了“言不尽意”的问题。他在《神思》篇中又说：“至于思表纤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笔固知止，至精而后阐其妙，至变而后通其数，伊挚不能言鼎，轮扁不能语斤，其微矣夫！”这怎么能象王元化同志在《文心雕龙创作论》中说的那样，是主张“言尽意”的呢？《隐秀》篇又说：“隐也者，文外之重旨也”。“隐之为体，义主文外。”这和后来诗论中强调“言有尽而意无穷”、“味外之旨”等是完全一样的。同时，王元化同志在引用《神思》篇中几句话来说明刘勰主张“言尽意”时，有断章取义的毛病，在标点上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原文是：“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王元化同志把“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和“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中间用逗号联起来，作为完整的一个意思，这就不符合原文意思。而且也忽略了“枢机方通”以下四句骈文上两句和下两句乃是互文见义，都包括“神”与“物”两方面状况，说明文思开塞的不同境界。范文澜同志注申引《文赋》“天机”一段为证，已说得非常清楚。

第二，关于构思过程中强调“虚静”的问题。《文赋》的重点是讲创作构思。陆机认为构思的成败，关键在能否做到内心的“虚静”。《文赋》开篇第一句“佇中区以玄览”，讲的是创作构思活动前的准备条件。“玄览”，李善注：“《老子》曰：涤除玄览。河上公曰：心居玄冥之处，览知万物，故谓之玄览。”历来注家对此均无异辞。许文雨更明确地说：“此道家深观物化之说。”“玄览”即是要“虚静”之意。在进入创作构思过程时候，《文赋》云：“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李善注云：“收视反听，言不视听也。耽思傍讯，静思而求之也。”诸家注释意均同。而这种“不视不听”的精神境界，也正是庄子讲的“虚静”的境界。《庄子·在宥》篇云：“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无视无听，抱神以静。无劳女（即“汝”，下同）形，无摇女精，乃可以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女神将守形，形乃长生。慎女内，闭女外，多知为败。我为女遂于大明之上矣。”王先谦注云：“遂，径达也。至人智照如日月，故名大明。有感而动，故曰遂于大明之上。”由“不视不听”而至于“大明”，也就是《天地》篇说的“视乎冥冥，听乎无声。冥冥之中，独见晓焉；无声之中，独闻和焉”。“虚静”的目的是为了达到智照日月，洞察一切。《文赋》又说在创作构思

发生“岨崕不安”的蹇蹇状况时，则应当“罄澄心以凝思，眇众虑而为言。”这也是指的“虚静”的精神境界。王士禛在《师友诗传录》中，就用这两句来解释刘禹锡所说的“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象。”<sup>①</sup>老庄的“虚静”说，在哲学思想上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认识论，但它运用在艺术创造中，主要是强调作家要最高度的集中精力，排除一切外界干扰，站在统观全局、烛照万物的角度，深入地进行构思，一心一意地从事创作。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创作的作品达到神化的程度，即所谓“用志必分，乃疑于神”。（《庄子·达生》）不论是庖丁解牛，还是梓庆削木为鐻、吕梁丈夫蹈水、痾偻者承蜩，其成功秘诀均在于此。从历史发展来看，唯心主义也不是没有过一点贡献的。当唯物主义还处于幼年时期，不能科学的解释许多复杂精神现象，而唯心主义则对它研究得很垦，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问题。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曾讲过这个问题。王元化同志说陆机、刘勰的“虚静”说是积极的，这是对的；但是说它和老庄的“虚静”说是对立的，这就不合适了。其实，王元化同志所举刘勰和老庄“虚静”说是对立的依据，即《文心雕龙·养气》篇的“水停以鉴，火静而朗”，和《庄子·天道》篇讲的“水静犹明”，心静如镜可照见万物，是完全一致的。而荀子所说“虚壹而静”以达到“大清明”境界和庄子由“虚静”而至“大明”境界也有共同之处。

第三，陆机是很重视灵感在创作中的作用的。他把灵感的产生归之于“天机”。《文赋》中说：

方天机之骏利，夫何纷而不理？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纷蕤葳以馥馥，唯毫素之所拟，文徽徽以溢目，音泠

---

<sup>①</sup>见《董氏武陵集纪》，原文“万象”为“万景”。刘禹锡这两句话正是庄子“虚静”说在文学创作中的运用和表现。

冷而盈耳。及其六情底滞，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揽管魂以探赜，顿精爽于自求。理翳翳而愈伏，思乙乙其若抽。是以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虽兹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勦。故时抚空怀而自惋，吾未识夫开塞之所由。

关于“天机”，李善注云：“《庄子》螭曰：‘今予动吾天机。’司马彪曰：‘天机，自然也。’又《大宗师》曰：‘其耆欲深者，其天机浅也。’刘障曰：‘言天机者，言万物转动，各有天性，任之自然，不知所由然也。’”这一段注是至关重要的。它告诉我们，陆机把“应感之会”和文思通塞归之于“天机”，也就是强调艺术创作的成败乃是决定于自然天性，而非人力之所能强求。这和老庄主张艺术要顺乎自然，反对人为造作，是一致的。这里陆机对灵感的解释确是具有唯心主义神秘色彩，这一点我们也不要为他讳言。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陆机那个历史时代，要对灵感这样复杂的精神活动现象作出科学的唯物主义的解释是不可能的。此外，我们还要看到陆机虽然强调“天机”，但在《文赋》中也反映出了只要能做到“虚静”那就能比较容易的获得“天机骏利”的机会。能够“收视反听，耽思傍讯”，就能“精骛八极，心游万仞”，而使“情瞳眊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能够“罄澄心以凝思，眇众虑而为言”，则就可能克服“咀晤而不安”、“踟躅于燥吻”的状况，而做到“妥帖而易施”、“流离于濡翰”，并最终达到“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的目的。所以，于光华《文选集评》引方曰：“此段（按，即指‘方天机之骏利’一段）极言文机通塞，与前收视反听一段尤踞一篇之胜”。

《文赋》对后代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其中最突出的是对《文心雕龙》的影响。章学诚《文史通义·文德》篇说：“刘勰氏

出，本陆机氏说，而昌论文心。”程会昌先生亦说：“刘氏文心，与之笙磬同音。”历代对《文赋》和《文心雕龙》之间的关系有过许多研究。对于这两部著作的基本倾向的一致性，向来是没有分歧的。但是解放以来对《文赋》的研究中，有的同志硬把《文赋》说成是形式主义的文学理论，而认为《文心雕龙》是反形式主义的现实主义理论。其实，《文赋》和《文心雕龙》在文艺思想上是完全一致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确实对《文赋》有过不少批评，但平心而论是有些过分的，这大概也是文人相轻的一种表现吧。对于这一点，骆鸿凯在《文选学》中曾经指出，认为刘勰对《文赋》的几处批评“皆疑少过。”我们从前人对《文赋》和《文心雕龙》的对照分析中，可以看出《文赋》实是《文心雕龙》的先驱，甚至可以这样说，没有《文赋》大概也就不会有《文心雕龙》。下面我们从《文赋》各段的主要观点及其论述，来看它和《文心雕龙》的密切关系。

《文赋》序一开始说：“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说明《文赋》的写作即是为了研究为文之用心。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篇中也说他所以取名其书为《文心雕龙》的缘由道：“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文赋》序接着就提出“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的问题，以及“随手之变，良难以辞逮”的观点。刘勰在《神思》，《序志》篇中也同样说了这个问题和观点。此已见上文，不再详说。

《文赋》首段论进行创作构思活动的准备条件，一是养心即“伫中区以玄览”，重在“虚静”；二是积学，即“颐情志于典坟”，强调学习儒家典籍。刘勰在《神思》篇中讲构思前的准备条件也是这两方面：“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恻辞。”但比陆机有更大发展。《文赋》指出，虚静养心的目的在使内心和

外物相交融，情思感物而动，达到主观和客观的统一。“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刘勰为此专写了《物色》篇。《文赋》说：“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游文章之林府，嘉丽藻之彬彬。”刘勰在《风骨》篇中则说：“若夫熔铸经典之范，翔集子史之术，洞晓情变，曲昭文体，然后能浮甲新意，雕画奇辞。昭体故意新而不乱，晓变故辞奇而不黩。”这正是对陆机这几句话的发挥。

《文赋》次段讲构思想象活动，着重在虚静的基础上开展丰富的想象，“精骛八极，心游万仞，”“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然后使艺术形象由萌生而致鲜明突出。意想中的形象构成后，就要努力寻找生动的语言将其表达出来。刘勰在《神思》篇也讲到这样一些内容，而且分析得更加透彻，并从理论上加以总结提出了“神与物游”和“意象”的概念。“神与物游”就是对艺术想象活动及其形象思维特征的生动概括，而“意象”则正是《文赋》所说的“情瞳眊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的产物。

《文赋》自“然后选义按部”至“含毫而邈然”一段讲的是创作中安排结构、部署意辞的问题。在这一段中，陆机首先强调了意辞的主从关系：“选义按部，考辞就班。”“理扶质而立干，文垂条而结繁。”刘勰在《文心雕龙》许多篇中都发展了这个思想。如《情采》篇说：“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然后辞畅。”“设模以位理，拟地以置心，心定而后结音，理正而后擒藻。”《熔裁》篇说：“情理设位，文采行乎其中。刚柔以立本，变通以趋时。立本有体，意或偏长，趋时无方，辞或繁杂。蹊要所司，职在熔裁，彙括情理，矫揉文采也。”其次，陆机指出了要根据具体情况，采用适合文章内容需要的多种结构方式。“或因枝以振叶，或沿波而讨源”，“或虎变而兽扰，或龙见而鸟澜。”刘勰在《附会》篇中也说到

这一点：“使众理虽繁，而无倒置之乖，群言虽多，而无棼丝之乱，扶阳而出条，顺阴而藏迹，首尾周密，表里一体，此附会之术也。”第三，陆机指出了安排结构、部署意辞的目的在于使“抱景者咸叩，怀响者毕弹”。让意和辞都能充分发挥其作用，把艺术形象描绘得更加生动鲜明，能够“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这也就是刘勰在《隐秀》篇中讲的要使文学作品“秘响傍通，伏采潜发”的意思。第四，陆机强调了文章要有感情色彩。“思涉乐其必笑，方言哀而已叹。”刘勰在《夸饰》篇中也说：“谈欢则字与笑并，论蹙则声共泣偕。”

《文赋》自“伊兹文之可乐”至“郁云起乎翰林”一段，说明创作都是从无到有，是有极大乐趣的。这个意思在《文心雕龙》中亦有不少体现。如《情采》篇云：“若乃综述性灵，敷写器象，镂心鸟迹之中，织辞渔网之上，其为彪炳，缦采名矣”。《体性》篇云：“笔区云涌，文苑波诡”等等。

从“体有万殊”至“故无取乎冗长”一段，陆机着重探讨了文章风格问题。他首先指出文章风格的多样化从根本上说是由客观事物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所决定的。其次，风格的不同与各种文体的不同特点有密切关系。再次，风格的特征是与作家的个性和爱好分不开的。陆机的这些观点，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作了充分的发挥。《文心雕龙》上篇论文体就是在陆机论十种文体和特征以及挚虞《文章流别论》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心雕龙》下篇中的《体性》、《才略》等篇就是专门论述文章风格体裁和作家的才性学习的关系的。此外，刘勰还论述到了风格和时代的关系，这是陆机所没有讲到的。

从“其为物也多姿”至“故渙涩而不鲜”一段，着重在说明会意、遣言、音乐美的运用的总原则是“达变而识次。”这个思想，刘勰在《通变》、《定势》、《声律》、《章句》、《练字》

等篇中都有体现。

至于《文赋》论文病九种，刘勰在《情采》、《熔裁》、《附会》、《章句》、《练字》、《隐秀》、《指瑕》各篇中，亦均有所涉及。现举数例如下：陆机反对因袭、雷同，主张创新，他说：“或藻思绮合，请丽芊眠。炳若缟绣，凄若繁弦。必所拟之不殊，乃闾合于曩篇。虽抒轴于予怀，怵他人之我先。苟伤廉而愆义，亦虽爱而必捐。”刘勰在《指瑕》中也表现了这样的主张：“又制同他文，理宜删革，若排人美辞，以为己力，宝玉大弓，终非其有。”陆机强调立片言以居要，为一篇之“警策”。刘勰在《隐秀》篇中说的“文之英蕤，有秀有隐。”“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这也就是陆机的“警策”。陆机反对“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的倾向，反对不讲内容而只重辞藻。这在《文心雕龙》中有许多表现。如《情采》篇说：“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快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并特别反对了“为文而造情”、“淫丽而烦滥”的倾向。《附会》篇说：“夫才量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然后品藻玄黄，摛振金玉，献可替否，以裁厥中。”《才略》篇还特别批评了殷仲文、谢混创作中“解散辞体，缥渺浮音。虽滔滔风流，而大浇文意”的毛病。

《文赋》在论述了九种文病之后，又总的指出，写好文章的根本原则仍在于“因宜适变”。这一点刘勰在《通变》、《附会》等篇中也都曾说到。由“普辞条与文律”至“顾取笑乎鸣玉”一段，乃是陆机对创作甘苦所发的感慨之词，也就是刘勰在《序志》篇中所说“识在瓶管，何能矩矱”之意。

从“若夫应感之会”至“吾未识夫开塞之所由也”一段，陆机着重分析了创作中的灵感问题。关于文思开塞问题，刘勰在《神思》篇中也作了分析，他也很重视灵感的重要作用，所以说

“秉心养术，无务苦虑，含章司契，不必劳情也”。但陆机认为灵感完全决定于“天机”，“非余力之所勦。”而刘勰在《养气》篇中则说明可以通过“养气”来使文思通畅，这就比陆机大大进了一步。但这也应该看到是在陆机提出灵感问题的基础上的发展。

《文赋》末段论“文用”，则与刘勰在《原道》篇中对文章作用的论述，是完全一致的。《原道》云：“爰自风性，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取象乎河洛，问数乎蓍龟，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然后能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挥事业，彪炳辞义。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这也就是对《文赋》所说“俯贻则于来叶，仰观象乎古人。济文武于将坠，宣风声于不泯。”“配沾润于云雨，象变化乎鬼神。被金石而德广，流管弦而日新”等等的发挥。

由此可见，《文赋》的基本内容在《文心雕龙》中都有不同程度上的反映。当然，刘勰比陆机全面、系统、深刻得多，并有极大的创造性的发挥，这是《文赋》所远远不及的。然而，《文心雕龙》的写作是得到《文赋》启发的，这也是必须肯定的。上述《文赋》与《文心雕龙》关系都是前人在研究中早已指出了的。所以，认真地吸取前人研究《文赋》的成果确实是非常必要的。

一九八〇年一月于北大

## 附 陆机《文赋》研究参考书目

### 一、对《文赋》注释有参考价值的《文选》注、评本：

- |                          |                         |
|--------------------------|-------------------------|
| 《文选》李善注                  | 《文选旁证》（清，梁章钜）           |
| 《文选》五臣注                  | 《文选笺证》（清，胡绍燮）           |
| 《文选考异》（宋，尤袤）             | 《文选集释》（清，朱琯）            |
| 《文选纂注》（明，张凤翼）            | 《选学胶言》（清，张云敬）           |
| 《文选章句》（明，陈与郊）            | 《文选考异》（清，胡克家）           |
| 《文选澹注》（明，闵齐华注，有<br>孙月峰评） | 《文选理学权舆》（清，汪师韩）         |
| 《文选集评》（清，于光华）            | 《选注规李》（清，徐攀凤）           |
| 《文选纪闻》（清，余萧客）            | 《选注纠何》（清，徐攀凤）           |
| 《文选李注补正》（清，孙志祖）          | 《文选课虚》（清，杭世骏）           |
| 《文选考异》（清，孙志祖）            | 《文选敏音》（清，赵晋）            |
| 《文选笔记》（清，许巽行）            | 《昭明文选六臣汇注疏解》（清，<br>顾施祯） |

### 二、历代对《文赋》有一些重要评论的文论著作：

- |             |   |
|-------------|---|
| 陆云《与兄平原书》   | 谢榛《四溟诗话》  |
| 陆厥《与沈约书》    | 何焯《义门读书记》   |
| 沈约《答陆厥书》    | 顾炎武《音学五书》   |
| 刘勰《文心雕龙》    | 王士禛《师友诗传录》  |
| 钟嵘《诗品序》     | 朱彝尊《钱舍人诗序》、《忆雪楼<br>诗集序》、《与高念祖论诗<br>书》（见《曝书亭集》卷37、<br>39、31） |
| 杜甫《醉歌行》     | 邓绎《日月篇》（见《藻川堂潭艺》）   |
| 楼颖《国秀集序》    | 袁守定《占毕丛谈》   |
| 徐祜卿《谈艺录》    |   |
| 吴讷《文章辨体序说》  |   |
| 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二 |   |

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  
汪师韩《诗学纂闻》“绮丽”条  
薛雪《一瓢诗话》  
章学诚《文史通义》中《文德》《辨

似》等篇  
王闿运《湘绮楼论诗文体法》(《国粹学报》第二年第23期)  
阮元《学海堂文笔策问》

### 三、“五四”以来的注释与研究论文:

唐大园《文赋注》(《德音月刊》第一期)  
骆鸿凯《文选学》  
郑石君《文赋义证》  
许文雨《文论讲疏》(正中书局版)  
李全佳《陆机〈文赋〉义证》(《中山学报》第二卷第二期)  
程会昌(千帆)《文论要论》  
叶楚伦《中国文学批评论文集》(正中书局版)  
陈柱《讲陆士衡〈文赋〉自记》(《学术世界》第一卷第四期)  
方竑《文赋释意》(《中国文学》〔重庆〕第一卷第三期)  
西谛《文赋》(读书札记)(《小说月报》第十四卷第五期)  
荷藕《陆机〈文赋〉论》(《中国文学》〔温州中学〕第二期)  
杨树芳《陆机〈文赋〉书后》(《协大艺文》第三期)  
朱绍安《〈文赋〉论文》(《励学》第五期)  
李廷玉《广陆机〈文赋〉》(《国学》〔天津〕第一卷第四期)  
请有琼《陆机文赋论“创作的准备”、论“运思”、论“辨

体”》(《经世日报》1947.11.5;1947.11.19;1948.2.18)  
范宁《陆机〈文赋〉与山水文学》(《国文月刊》第66期)  
逯钦立《〈文赋〉撰出年代考》(《学原》第二卷第一期)  
陆侃如《关于〈文赋〉》(《春秋》第六卷第四期)  
朱东润《陆机年表》(《武大文哲季刊》第一卷第一册)  
朱自清《诗言志辨》  
姜亮夫《陆平原年谱》  
景卯《关于〈文赋〉一些问题的商榷》(《光明日报》1959.9.13)  
吴震亚《如何评价〈文赋〉?》(《光明日报》1959.12.27)  
胡国瑞《谈陆机的〈文赋〉》(《光明日报》1960.4.17)  
陆侃如《陆机〈文赋〉二例》(《文学评论》1961年第一期)  
陆侃如《陆机的创作理论和创作实践》(《文汇报》1961.8.1)  
振甫《谈陆机〈文赋〉》(《文艺报》1961年第七期)  
周振甫《陆机〈文赋〉试译》(《新

闻业务》1961年第三期)

郭绍虞《对〈文赋〉所谓“意”的理解》(《文汇报》1961.8.12)

郭绍虞《论陆机〈文赋〉中之所谓“意”》(《文学评论》1961年第四期)

刘禹昌《陆机〈文赋〉译注》(《长春》1962年第一、二月号)

夏承焘《关于陆机〈文赋〉的三个问题》(《文艺报》1962年第七期)

万曼《读〈文赋〉札记》(《光明日报》1962.9.2)

周汝昌《陆机〈文赋〉“缘情绮靡”说的意义》(《文史哲》1963年第二期)

吴调公《〈文赋〉的艺术构思论》(《南京师范学院学报》1963年第一期)

郭绍虞《关于〈文赋〉的评价》(《文学评论》1963年第四期)

马南屏等《关于〈文赋〉评价》通信(《文学评论》1963年第六期)

北京大学中文系《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关于〈文赋〉注释

王纯庵《〈文赋〉初探》(《辽宁第一师范学院学报》1978年第二期)

吴功正《陆机的〈文赋〉》(《长春》1978年第三期)

张文勋《关于〈文赋〉的几个问题》(《思想战线》1978年第五期)

袁千正《精骛八极、心游万仞——陆机对形象思维的认识》(《延河》1978年第七期)

兰天《〈文赋〉译注》(《河北大学学报》1979年第二期)

邱世友《离方遁园，穷形尽相——陆机论艺术形象》(《文学评论丛刊》第一辑)

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中的《释〈物色篇〉心物交融说》、《释〈神思篇〉杼轴 献 功说》及附录三、四、《释〈体性篇〉才性说》、《释〈比兴篇〉拟容取心说》及附录一、《释〈养气篇〉率志委和说》及附录一等篇

牟世金《〈文赋〉的主要贡献何在》(《文史哲》1980年第一期)

梁溪生《〈文赋〉今译》(《江苏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一期)

附记：关于“五四”以来有关《文赋》研究论文及注释的目录，曾得到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吴文治同志帮助的，特此志谢！